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集刊

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集刊
第五集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308千字

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册

统一书号: 4190·100 定价: 1.35元

目 录

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	吴承明 (1)
十七世纪前期徽州租佃关系的一个微观研究 ——歙县胡姓《怀忻公租簿》剖析·····	章有义 (33)
关于清代奴婢制度的几个问题·····	经君健 (60)
清代宝泉宝源局与铸钱工业·····	彭泽益 (179)
试论清前期景德镇制瓷业中官窑、行会同资本主义 萌芽的关系·····	胡铁文 (205)
论清代后期各种类型农业经营的发展 及其社会性质·····	李文治 (225)
汇丰银行的成立及其在中国的初期活动·····	汪敬虞 (267)
清代买办收入的估计及其使用方向·····	王 水 (298)
所谓“基督教文明”和西属美洲 印第安人的绝灭·····	严中平 (325)
1980年国内报刊关于中国经济史论文类目·····	(361)

CONTENTS

Internal Market and Merchant Capital in the Ming Period.....	Wu Chengming (1)
A Micrological Study of Huizhou (徽州) Land Tenure in the Early 17th Century —A Dissection into the Rent Rolls of a Shexian (歙县) Landlord.....	Zhang Yuyi (33)
A Few Questions on the Nu-be (奴婢) System in the Qing Dynasty	Jing Junjian (60)
The Baoquanju (宝泉局) and the Baoyuanju (宝源局) in the Money Coining Industry of Qing Empire.....	Peng Zeyi (179)
State-run Kilns and Guilds in Jingdezhen (景德镇) Porcelian Industry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ir Relations to the Rudiment of Capitalism.....	Hu Tiewen (205)
Development of Various Forms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Late Qing Period and its Social Significance.....	Li Wenzhi (225)
Establishment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and its Early Activities in China...	Wang Jingyu (261)
An Estimate of Chinese Compradore's Earnings and Their Disposal.....	Wang Shui (298)
The So-called "Christian Civilization" and the Extinction of Indians in Spanish America	Yan Zhongping (325)
Appendix: A Catalogue of Articles on Economic History in Chinese Periodicals, 1980.	(361)

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

吴 承 明

一、导 论

市场源于分工。但市场一词，因所论目的不同而有不同概念。本文目的在探讨十五世纪以来我国国内市场变化对于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作用。因而可定义为：商品流通形成市场。商品流通的量决定市场的大小，商品交换的内容决定市场的性质。我采用市场一词，因为它（比流通）并可包括地理、价格等涵义。

“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①但是，商品流通不决定生产方式。在不同市场上，其作用不同。我国的市场，大体可归为四类。

第一，地方小市场，如墟集贸易。它们作为小生产者品种、余缺调剂的场所，原是自然经济的内容之一，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对立的。人口增加，墟集随之发达，而不一定反映商品经济的发展。临近大市场的集市也有一些流通作用^②，但一般说，它们成为某些商品的集散地，即市场性质的改变，主要还是在资本主义性的商业发展之后。

第二，城市市场。和西欧不同，我国封建城市原来都是各级

① 马克思：《资本论》卷1，页167。

② 王建：《汴洛纪事》：“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

政权的统治中心，或为驻军而设，它集中了大量纯消费人口，商业一向比较发达。^①其中有些城市也是商品流通中心，但最发达的乃是供城市人口消费的零售商业和饮食、服务行业。这种商业（在近代消费社会兴起以前）并不是执行流通任务的职能商业资本，对本文所述目的来说，无重要作用。^②象《东京梦华录》《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繁华景象，只不过反映封建经济的高度成熟而已。宋以后，沿交通要道新兴商业城市的出现，才真正反映商品流通的扩大。而县以下的手工业和商业镇市的出现，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区域市场，如通常“岭南”“淮北”这些概念和多数省区范围内的市场。它们基本上是根据同一自然地理条件和群众共同生活习惯形成的，因而，区域内的流通一般不反映生产的地域性分工，而可视为自然经济的地方小市场的延伸。^③并且，区域内的自给自足有时还会招致封建割据，妨碍流通。不过，就一个省区范围来说，它已包含有比较广的商品交换了。由于市场的由小而大常是工业品（这时是手工业品）参加交换的结果^④，区域内城乡之间的交换，作为工农业产品交换，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它反映社会分工的发展。

① 西欧古代城市大都在日耳曼人大迁徙中被摧毁，中世纪的封建城市主要是十世纪后由工商业者和从领主庄园中逃亡的农奴建立的，主要居民是手工业者和商人，十六世纪初才有十万人口以上城市出现。我国唐代即有十万人口以上城市13座，北宋时达46座。

② 零售商业本来是“原始的、粗糙的”商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5，页373），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后，它仍然是一种“不执行职能或半执行职能”的“杂种”商业，而非商人资本的“纯粹形式”（《资本论》卷3，页317、320）。

③ 原来所谓自然经济，并不是指一家一户的自给自足（这从来是不可能的），而是指一个氏族、村社、家长奴隶制大家族、封建领地这种“单一的经济单位”（《列宁选集》卷1，页161），因为绝大部分经济条件可以“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资本论》卷3，页896），而这才是自然经济或“自给自足”的真正含义。

④ 农产品与农产品交换，市场范围愈小愈好，因输送里程增加一倍，会使费用增加二倍。若是工业品（手工业品）参加交换，情况就不同了。因工业品大量生产可降低成本，而输送费用所占比重不大，这就会引起市场延伸。

“农业品与工业品交换形成市场”这一重农学派的古老概念，对本文目的来说颇为有用。在研究一种商品流通时，不仅看它的流通量，还要看它是与什么东西交换。

顺便还要提到一种情况。封建王朝，每年都征发大量田赋以及丝、茶等课或贡（明初约合3,000—4,000万石粮食的价值）。由于折色（尤其是一条鞭法以后）、派解，这些产品也会进入商人之手，进入流通。但从农村方面看，它是单向流出而没有东西与之交换，因而不是商品，也不形成真正的市场，不发生本文所要求的作用。农民为交租，还债而不得不暂时卖出的口粮（类似返销粮），实际也是没有交换的，不能计入商品量。

第四，跨区域的大市场，也可称为全国性市场，相当于欧洲的所谓民族市场。这才是作为扩大再生产的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主要依据。一个小地区内的活动可以积累财富，但不能积累资本。所谓“里有入君之尊，邑有公侯之富”，但出不了资本家。资本的腿要长些。

在这种大市场中的流通，也就是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本文将从主要商路和主要商品的运销上来考察这种贸易。海外市场亦具有同样作用。不过，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海上国家，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基本上是靠国内市场。

我国很早就有了相当发达的长距离贩运贸易。但在宋以前，主要是珍奇宝货等奢侈品贸易和土贡式的特产品贸易。这种贸易，不仅所贩运的是已生产出来的（不是为市场而生产的）产品，其消费也主要是上层统治阶级。这种贸易，是产品与收入的交换，不是商品之间的交换；而上层阶级的收入，归根到底不外是地租转化形态。因而这种贸易，基本上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范畴内进行的，对本文目的来说，可以不予改虑。

就本文目的来说，我们研究中国的市场，应当不为那些目迷五色的《梦梁录》式的都会零售市场（以及“草市寒沽酒”的地方小市场）所惑，排除那些奢侈品的、土贡式的、没有商品交换

的贸易，而着重探讨重要商品的长距离贩运和大批量交易，尤其是工农业产品的交换。对于文献中“舟车鳞次”“店肆栉比”等无具体概念的和一些显然是夸张的描述，本文也不取。

我国国内市场，大约从十五世纪起开始发生一种定向性变化，这种变化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前期。鸦片战争后，开始另一种定向性变化。本文就是试图分析这些变化对于我国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关系。

市场，从来就有个量的概念。但在明代史料中，还很难进行定量分析，我只是尽可能提出一些量的概念。在清代和近代市场的考察中——这将成为本文的续篇，我希望尽可能作些计量分析，并试图探索十九世纪前期和鸦片战争后我国国内市场的模式。

对于市场和商品流通的上述观点，只是个人在学习中不成熟的想法，难免谬误与偏见，仅先缕出，求教于贤明。

二、明代的国内市场

我国封建商业在宋代有较大发展，突破了坊市制，并有一些商业城市出现，但主要是在沿海地区，如广州、泉州、明州、秀州等，反映海运贸易的发展。经元代大规模修建水陆驿道，到明王朝，随着经济作物和手工业的发展，国内市场显著扩大。究竟扩大到什么程度，由于缺乏计量资料，还只能从一些主要商路的延长和商业城镇的兴起来见其梗概。

长江航运是我国最重要的一条商品渠道。宋代的长江贸易主要是集中在下游。明初也还是这样。宣德间，明王朝设有33个征收商品流通税的钞关，其中15个在长江沿线，即上游的成都、泸州、重庆；中游的荆州、武昌；而有10个集中在下游，即扬州、镇江、仪征、江宁、常州、苏州、嘉兴、杭州、湖州、松江，并

限于江苏、浙江两省。但到正德以后，钞关剧增，芜湖、宁波成为新兴商业城市，就是说，这个最繁盛的贸易区向东西延伸了。长江中游的荆州、武昌，本来都是军政重镇，武昌虽已“四方之贾云集”^①，但比清代的汉口镇还相差远甚。不过到明后期，沙市、九江成为新兴商业城市，这样就与长江下游珠连起来了。这是一个重要发展。至于上游的成都、泸州、重庆三钞关，主要还是处理本区域贸易，这时尚无粮食出川，与下江主要是丝、茶等细货贸易，贸易量有限。

总之，明后期长江贸易有了发展，不过主要还是在下游和中游，又主要是由于江、浙两省桑、棉和手工业的发展所致。这时两湖丘陵地带和川、滇尚未大力开发。据我看，明代国内市场的开辟恐怕更重要的是南北贸易方面，尤其是大运河的畅通，以及沿赣江南下过庾岭到两广一路的开通。

大运河自元代开会通河后，补救了黄河改道的困难。但元代漕粮仍以海运为主。明永乐九年（1411）重开会通河，运河才畅行无阻。运河原为漕运（不属商品流通），但官船都带私货，而商船亦可包揽一位官员乘坐，即可沿途免税，所谓“官家货少私货多，南来裁谷北裁盐，凭官附势如火热，趸人津吏不敢诘”^②，所以实际是一条重要商路。

大运河自北京（通州）至杭州全长一千余公里，河漕（利用黄河一段）以下，航运尤繁，并由河漕东走济南，西走开封。明初人孙作说：“自杭走汴，水陆二千里，如游乡井，如入堂奥，如息卧内。”^③宣德间，沿北运河在北京、德州、临清、济宁和在济南、开封设6个钞关。其中临清是元代兴起的商业城市，济宁是明代官商会聚之地。中叶以后，北部的天津、南部的淮安，又都是新兴商业城市。又有通州和天津之间的河西务，临清和济宁

① 张瀚：《松窗梦语》卷4。

② 李东阳：《怀麓堂文后集编》卷1，马船行。所说是江浙马船，据余继登：《典故纪闻》卷13，运河情况亦然。

③ 孙作：《沧螺集》卷2，送淮南省掾梅择之序。

之间的张秋镇，成为新兴商埠。再如北直隶的保定，清苑，河间、景州，虽不临河，但也因漕运关系，“商贾肩相摩”^①。又如山东的清源，原属荒村，正统间因战争筑城，但随着淮北水运的发展，到嘉靖时就又筑新城，成为“商旅往来，日夜无休”^②的商业城市了。

明初，赣江水运已颇盛，设有南昌、清江、临江、吉安四个钞关。其后，九江设关；饶州、景德镇商旅日繁；而铅山县的河口，由二、三户人家“而百而十”，到嘉、万时已“舟车四出，货饒所兴”，成为“铅山之重镇”^③。赣江贸易的发展，又是和大庾岭山路的整修分不开的。这样一来，赣州成为一大商业城市，庾岭路上，“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冬无寒土”^④，和苏轼过庾岭时“一夜东风吹石裂”“细雨梅花正断魂”的景象大不相同了。

明人李鼎说：“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⑤南北货运的流畅，大约是明代市场扩大的一个特征。下面在叙述商品运销中，还可见到。不过，明代运河贸易的发展，多半还是因为政治中心在北方，以及北边多事、行开中制等原因；南货北运者多，北方出产有限，故漕船常回空。因而，这种市场的扩大，并不完全反映地区分工和商品生产的发展。

以上是长距离贩运的主要商路。此外，如北边宣化，主要是两淮、长芦盐运集中地；湖北襄阳，主要是西南木材集中地；各有局限性。西北太原、平阳、蒲州、早设钞关，但主要是处理本区域贸易。后期发展起来的西安，则“西人陇蜀，东走齐鲁”^⑥，使西北商路稍畅。更远的到辽东一路，商货多由山东临清转运，限于细货，为量有限，而海路在明代反衰落。近人常引宋应星《滇

① 查志隆：《金台郡城西北二桥记事》，载民国《清苑县志》卷5。

② 周思兼：《周叔夜先生集》卷5，二城记。

③ 费元禄：《愚采馆清课》卷上。

④ 桑悦：《重修岭路记》，载雍正《江西通志》卷130。

⑤ 李鼎：《李长卿集》卷19，借箸编。

⑥ 张瀚：《松窗梦语》卷4。

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宣商，衡游薊北”，那显然是夸张了。^①

县以下商业镇市的兴起，却是值得注意。因为这些镇市，除上述河西务、张秋、河口等处，都是在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品产区，货量不太多，但都远销，实际是长距离贩运贸易的起点。不过，大都是集中在江、浙一隅之地，如苏州的枫桥，湖州的菱湖，嘉兴的丰塘，杭州的范村等。还有一些由丝织业发展起来的手工业镇市。如苏州的盛泽镇，明初是五、六十家的村，嘉靖时成为百多家的市，居民“以绫紬为业”^②；震泽镇，元时仅数十家，嘉靖时已七、八百家，“竞逐绫紬之利”^③。嘉兴的濮院镇，万历时“日出锦百匹”，“人可万家”^④。这些镇上的居民已由农业分离出来，或者虽未分离但也是为市场而生产了，这些地方就成为商品生产的基地，商贾云集。嘉兴的王江泾镇，“多织绸收丝縞之利，居民可七千余家，不务耕绩多”^⑤。七千多家，多数不耕地、不绩麻，不从事自给性的生产了。因而“四方商贾俱至此收货”，“做买做卖的挨挤不开”^⑥。

最后，结合海外贸易，看一下福建、广东的海运。

我国海外贸易在宋代有较大发展，通商五十余国，进出口商品数百种。明代丝织、瓷器、棉布、漆器、糖等出口品的生产都有发展，造船和航海技术在宋代基础上也有改进^⑦，正是发展海

① 宋应星：《天工开物》序。此语下文：“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其实是说信息传播，不是指运输。

② 嘉靖《吴江县志》。

③ 乾隆《震泽县志》卷4，疆土；卷25，生业。

④ 杨树本：《濮川所闻记》卷4。

⑤ 万历《秀水县志》卷1，市镇。

⑥ 《石点头》卷4。

⑦ 明代出海以广船、福船、沙船为主。广船、福船是尖底船，能用多段龙骨，创于宋代。沙船是平底船，用平板龙骨，靠两舷大撇加固，宽敞，干舷低，稳性好，比较安全。沙船之名，明代始见，日本称南京船，当是明造。但宋代即有防沙平底船。明代的改进，大约在于用披水板（橈头）和升降舵，使船能逆风行驶。又这种船，元代载重达八、九千石，多桅多帆。明代一般载二、三千石；并由多帆改为二、三帆、帆下宽，以降低风压中心；这都增加了稳性和灵活性。郑和下西洋大约即用沙船，其大者称宝船，长150米，张12帆。在航海技术上，明代改进牵星术，除北极星外，并观测方位星。又广用罗盘，创更香计时，制成方向与时间结合的针路图。

外贸易的良好时机。但是，明开国之初，即严海禁，“敢有私下诸蕃互市者，必寘之重法”^①。虽设广州、宁波、泉州等市舶司，但实行所谓朝贡贸易，对外使横加限制，两三年甚至八年十年始准来华一次。永乐后，弛禁之仪屡起，但总是以禁为主。到隆庆初（1567），始“除贩夷之律”，而仍有不少限制。所幸这种政策不能阻止经济发展的要求，私人海上贸易并未断绝，但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则是肯定的。

明代的海外市场主要是南洋，次为日本。南洋有二商路，称大西洋和东洋。大西洋以越南（安南）、柬埔寨（占城）、暹罗为主，进口主要是苏木、胡椒、犀角、象牙等天然产物，而中国出口则以工艺品为主，以及铜、汞等矿产品，这又是贸易上的一个有利条件。东洋指吕宋（佛郎机），进口品种有限，多是以银换取中国物产。外贸利润很厚，“湖丝百觔，价值百两者，至彼得价二倍”^②。输往日本者，更多系日用工艺品，丝绸、瓷器之外，棉布、布席、扇、脂粉等都能畅销。明庭禁通日本又甚于南洋，因而在贸易上“东之利倍蓰于西”^③。

明代的海外贸易，由于正德至嘉靖间一度严格海禁，到万历以后才有较大增进。这对广东、福建两地经济颇有影响。明代经济作物最发达的地区是福建，又接近江、浙手工业产区，外贸中心也由南宋时的广州移到福建来了。万历时，有人说：“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延之铁，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④话虽如此，福建的商品性生产，究竟运销海外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是运销内陆以换取粮食。福建的关税收入万历初年只有二万两，崇祯最高时也不过五、六万两^⑤，而南宋绍兴时广州市舶司的税收曾年达110万

① 明《太祖实录》卷231。

② 傅之初：《请开洋禁疏》，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26册。

③ 王世贞：《漫游纪略》卷1，闽游。

④ 王世懋：《闽部疏》。

⑤ 傅之初：《请开洋禁疏》，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26册。

赏。明代的海外市场，恐怕是比宋代缩小了。

西欧的资本主义萌芽，大量借助于海外市场，在地中海沿岸和北欧低地，尤其是这样。当时我国开辟海外市场的能力，从出口商品看，从航海技术看，从郑和七下西洋的交通路线看，都是很大的。而明（以及清）王朝的禁海政策，起了很大的阻塞作用。我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只能依靠国内市场。

三、主要商品的运销

市场扩大，只是商品流通的一个侧面，它的性质和作用，还要看进入流通的是些什么商品，以及其交换的对象。明代长距离的商品运销，就我所见，重要的有：（一）粮食；（二）棉花和棉布；（三）丝和丝织品。盐和茶也是长距离运销的重要商品，但都属专卖性质，我把它放在下节论商人资本中去考察。

（一）粮食的运销

粮食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商品，不仅因为它流通量大，而且粮食商品率（指对产量而言）的大小，是测量自然经济结构演变的最重要的指标。

如前所说，在考虑粮食的商品流通时，首先要排除田赋、加派等非商品部分。这以外，在封建社会，粮食的交易就主要是在地方小市场上的品种调剂和在区域市场内供城镇人口的需要。前者是小生产者之间的、实际是使用价值的交换。供城镇人口需要的，一部分是住城镇地主所收租谷，实际没有流通，其余也主要是来自附近的农村。粮食体大价低，原是不适于远销的。以明代而论，大约每年的漕粮和开中纳粟，已可供京畿官吏、工役和北边驻军所需，此外并不需要南粮北调。有些地方，如河间府，需粮食调剂：“贩粟者至自卫辉、磁州并天津沿河一带，间以年之

丰歉，或余之使来，或果之使去，皆辇致之。”^①这种有来有去的情况大约相当普遍，并且多半还是区域内的运销。较长距离的运销，主要是供应东南经济作物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口粮，也只有这种交换，最能反映地区分工和社会分工。这在明前期，尚未见记载，估计主要是明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

长江三角洲一带是当时桑、棉经济作物和手工业最发达地区，常患粮食不足。不过，这个地区本来是鱼米之乡，有粮外运，宋人所谓“苏常熟，天下足”^②。到明后期，常州米仍然外调浙江^③，湖州米接济杭州^④，常山米取给于附近的玉山、西安^⑤，宁波米取给于邻府台州^⑥，就是说，区域内的调剂甚繁。但整个区域仍有未足，须由湖北、江西、安徽运入，所谓“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粟”^⑦。说“半仰食”可能夸大了，我们没有可靠材料，估计每年运入几百万石也就够了。

福建是经济作物发展最早的地区，这时烟草尚少，但甘蔗已普遍，又有茶、麻、苧、蜡、蓝靛、菓木等。手工业也发达，前引《闽部疏》已见。和江苏、浙江不同，福建地多山陵，粮食本非丰腴，这样一来，必难自给。其中温州米运福州^⑧，尚属近距离调剂，甘蔗产地泉州，则需“仰粟于外，上吴越而下东广”^⑨。值得注意的是广东米海运入闽，据说“往者海道通行虎门无阻，闽中白艚、黑艚盗载谷米者岁以千余艘计”^⑩，这就怕有近百万

① 万历《河间府志》卷4，风土志。

② 陆游：《渭南文集》卷20，常州奔牛闸记。叶绍翁《四湖见闻录》乙集、关泳《鹤林集》卷39均作“苏湖熟，天下足”。

③ 常熟“每岁杭、越、徽、衢之贾皆问余于邑。”嘉靖《常熟县志》卷4，食货志。

④ 杭州“城中米珠取于湖〔州〕，……人无担石之储”。《肇域志》第9册，浙江。

⑤ 常山“米谷豆面之类，苟非玉山、西安通权，则终岁饥饉者十家而七矣。”王士性：《广志绎》卷4。

⑥ 宁波食米“常取足于台〔州〕”。王士性：《广志绎》卷4。

⑦ 吴应箕：《楼山堂集》卷10。

⑧ 福州食米“常取给于温〔州〕”。王士性：《广志绎》卷4。

⑨ 何乔远：《闽书》卷38，风俗志。

⑩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食语，谷。

石了。况且，广东食米原是靠广西接济^①，而“盗载”（因朝廷禁海运）如此之巨，可见福建米缺。而自江、浙输闽之米，恐怕又多于广东。福建省大约可以说是当时自然经济受到破坏最多的省份，但也是全国发生这种情况的唯一省份。

安徽南部的徽州一带，是个茶、木材和纸、墨产区，其土地贫瘠，粮食不足。这个地区虽小，购买力则较高（大约经商之故），粮食运至颇远，在明后期，“大半取给于江西、湖广之稻以足食者也，商贾从数千里转输。”^②

以上是粮食输入的主要地区。

粮食输出的地区，就我所见资料，只有两个。一是江西南部。“赣〔州〕亡他产，颇饶稻谷，自豫章、吴会咸取给焉。两关转谷之舟，日络绎不绝，即俭岁亦橹声相闻。”^③另一个是安徽江北一带。“六皖皆产谷，而桐〔城〕之辐輳更广，所出更饶。计繇〔由〕枞〔川〕阳口达于江者，桐居十之九，怀〔宁〕居十之六，潜〔山〕居十之三”^④。这两个地区都米谷丰饶，到近代还是这样。不过供应江、浙需要，恐怕还有未足（赣米还要供应本省南昌）。长江中游一带即湖广的米，在明后期大约已有东运，唯史料未详，或者数量还有限。

总看上述分析，明代商品粮食的运销，主要还是在长江下游，即九江以下的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五省，其中又很多是本区域内部调剂。象清代的湘米大量东运、川米出川、东三省豆麦南下等大规模运销，明代尚未出现。在明后期，较长距离的粮食运销，包括广东米北上，恐怕不超过1,000万石。按嘉靖间米价每石0.85两计，约值银850万两^⑤。

① 王士性：《广志绎》卷5。

② 吴应箕：《横山堂集》卷12，江南平物价议。

③ 天启：《赣州府志》卷3，舆地志3。

④ 《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卷28，稻部，引明方郁韩：《枞川榷稻议》。

⑤ 据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皇明经世文编》卷261、312，《云间杂志》卷中，郑晓《郑端公奏议》卷6，采九德《倭变事略》卷2所记嘉靖二年至四十五年米价平均计算，为每石0.85两。

粮食是农民个体生产的。进入长距离运销的粮食，部分是小生产者的余粮，而大部分是来自地主的租谷。无论何者，都是由于商人资本的运动而使已生产出来的产品变成商品。尽管在贩运利润的作用下，可以促使地主加强剥削，或鼓励开垦，就生产者来说，总不是商品生产。所以，粮食贩运，是当时最大量的商品流通，但也是最典型的封建商业，在当时条件下，无助于改变生产关系。但是，粮食的长距离贩运主要是输往东南经济作物和手工业产区，它反映了后者的发展，并对这种发展起着保证作用。

（二）棉花和棉布的运销

棉花的种植是在明代推广的，而这时农民织布还不普遍，主要集中在江苏南部一带，因而棉花和棉布都有较繁的长距离运销。徐光启说：“今北方之吉贝（木棉）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①这是总的流向。

当时北棉南运，主要是河南、山东的棉花，万历间锤化民说：“臣见中州沃壤，半植木棉，乃棉花尽归商贩，民间衣服率从贸易”^②。又有记载说南阳李义卿“家有地千亩，多种棉花，收后载往湖、湘间货之”^③。这是河南棉花。山东植棉，“六府皆有，东昌尤多，商入贸于四方，其利甚溥。”^④东昌府的棉花以高唐、恩县、夏津为集中地，“江淮贾客，列肆齎收”^⑤。兖州府也多棉，“商贾转鬻江南”^⑥；而郓城是另一集中地，“贾人转鬻于江南，为市肆居焉。”^⑦

江苏省太仓州所产棉花，也向南贩运^⑧，而嘉定的新泾镇，

①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5，木棉。

② 《救荒图说》，载《荒政丛书》卷5，锤忠惠公愍豫记。

③ 张翥：《西园闻见录》卷17。

④ 万历：《山东通志》卷8。

⑤ 《望城志》第32册，山东。

⑥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23，兖州府部，风俗考。

⑦ 万历《兖州府志》卷4。

⑧ “九月中，南方贩客至，城中男子多轧花生业”。崇祯《太仓州志》卷5。

遂成为棉花交易市场，“每岁棉花入市，牙行多聚”^①。不过，太仓州的棉花不少是运销福建。福建在宋代是最早的植棉区，到明代则甚少栽培了。“隆万中，闽商大至〔太仓〕州”购棉，吴梅村曾咏其盛况^②。

江西棉花，生产未详，但有棉经大庾岭运销广东。广东惠州，棉花“仰江西者恒什五”^③。明代湖广的江花，产量亦丰，但少见外销记载^④，可能有运往广东者^⑤。

明代棉纺织业，集中在松江、嘉定、常熟三地，有松江布、嘉定布、常熟布之称，而以松江产量最大。但松江府原系产棉区，从后来产布最盛时情况看，其所需棉花可以自足，并有余花供毗邻的浙江嘉兴、嘉善一带织户。由北方南运的棉花，大约主要供应滨海各县，那里农民也多织布。嘉定位于太仓州产棉区，棉花亦可自足。常熟缺棉，大约须由北棉接济。

松江布的运销，叶梦珠《阅世篇》所记最详。他是记清初上海县（属松江府），但兼及明代：“棉花布，吾邑所产，已有三等，而松城之飞花、尤墩、眉织不与焉。上阔尖细者曰标布，…俱走秦晋、京边诸路。每匹约值银一钱五、六分，最精不过一钱七、八分至二钱为止。…其较标布稍狭而长者曰中机，走湖广、江西、西广诸路。价与标布等。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中机客少，资本亦微，而所出之布亦无几。至本朝，而标客巨商罕至，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年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而中机之行转盛。……更有最狭短者曰小布，单行于江西之饶州等

① 万历《嘉定县志》卷1，市镇。

② “眼见当初万历间，陈花富户积如山。温州古鞋乌言贾，腰下千金过百滩。”《梅村家藏稿》卷10，本棉吟。

③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130，惠州府部，物产考。

④ 《花村谈往》卷二记有正德间“荆湖川蜀远下客商所带板枝花俱结算在十”一例。板枝花是絮棉，主指京口牙行主人。

⑤ 广东“冬布多至自吴楚，……与棉花皆为正货。粤地所产吉贝，不足以供十陌之用。”周大均：《广东新语》卷15，货语，葛布。